

我的帝大生活——兼述東北十一載

王江村口述
林秀美整理

高校的校風自由自在，

旨在創造一個人的人格，

但進入帝大則不同，

大家都變成紳士，因為體認到

三年後要做社會人，要負責任了。

自信加努力，求學途順遂

大正元年（1912）我出生在台南市，

當時稱「白金町」的地方（今忠義路），父親與兄哥（同父異母的兄弟）做雜貨生意，父親五十二歲即過世，當時我十六歲，由兄哥繼續栽培，從小生活優裕，因此極有自信。

台南二中畢業後（專收台灣人的初中，台南一中收日本人），到東京明治大學附屬中學就讀，三年後回台，第二年考上台北高等學校（今師大），讀了三年，1934年四月進入台北帝國大學政學部，1937年二月取得



▲王江村先生大學時英姿。
（王江村提供）

法學士學位。

台灣當時的普通中學為五年制，第四年即可參加高等學校考試，高校是當年最難考的學校，錄取率為十五取一，因為大多數高校生三年後可直升台北帝大。

高等學校有文、理兩科，每科又以語言分甲、乙類，甲類主修英文，乙類主修德語，當年帝大醫學部以德國為主，所以想進醫科的人要讀理科乙類，台灣人選讀醫科居多，家人也希望我讀醫，但我不想。日本人不讓台灣人讀政治，所以文政學部學生較少。

我一人北上求學，帝大時沒有宿舍住，於是和七位同學在六條通（中山北路一段）租房子，並僱了一位客家婦女為我們煮飯。我們八個人背景互異，除了我高校畢業外，有一位是醫專，其他六人則是來自台北高商。

每天一同坐巴士去上課，感情極為融洽。

房租月租六元，學費大部分由政府負擔，我估算過，大學三年所需學雜費，平均每每人一萬四千美金，而當時一斤香蕉只要一分日幣。

學風尚自由，少年總輕狂

高校教育較重視的是人格培養，學風很自由，學生若乖乖，學校不會管你，若在外惹事，校長出面解決。當年城內只有兩家咖啡廳，一在太平町（重慶北路）叫「波麗露」，一在中山堂對面叫「白百合」，另外衡陽路上有明治和森永兩家喫茶店，我最常去波麗露和明治，有錢時每人都喝一杯咖啡，沒錢時就點一杯蘇打水，四、五個人在店裏耗一下午，也常常去新世界、大世界和國際戲院看電影，那是個很自由的時代，沒什麼操心的事，三年就這樣馬馬虎虎過去了。

惟一一件事令人現在想到都還會生氣，當時台灣的警察氣焰高張，對台灣人很壞，晚上騎腳踏車規定要開燈，否則就抓人，我曾經被抓過，若有學生被抓，不論認識與否，我們就去包圍警察局，大家喝了酒，圍攔唱校歌，然後一個個進去借便所，他不堪其擾，看破就放你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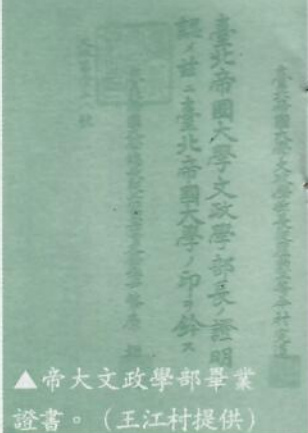
高校的校風自由自在，旨在創造一個人的人格；但進入帝大則不同，大家都變成紳士，因為體認到三年後

要做社會人，要負責任了。

政學科主修科目



▲英挺少年時。昭和十二年（1937）政學部畢業生攝於校門口，前排左起：大歲德一、松尾正三、馮正樞（台）、金江有智，後排左起：川添三郎、王江村（台）、黃國鎮（台）、陳加溪（台）、林維吾（台）、林緒成（台）。該屆畢業台籍生六人，日籍生四人，合計十人。王江村和林緒成健在，林維吾病榻中。（王江村提供）



▲帝大文政學部畢業證書。(王江村提供)

包括法律、經濟和政治，不過西洋文學、心理學等也都

要讀，一週大約要上四、五門課，演習課（討論）不考試，其他課期末考一次，成績分優、良、可和不可四等，通常學期結束前，自知吊車尾的學生會走後門向老師討分數。學風很自由，一年不去上課也沒關係，只要你能在三年內修滿33個單位即可畢業。不過到昭和十六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軍國主義膨脹，學生上課作息就較為嚴苛。參考書很貴，當時出參考書的有兩家，分別是新高堂和次高堂，新高堂所在即今衡陽路東方書局。

高校時同儕都膩在一起，比較親近，到了大學就各走各的，獨立性強。那時老師都是出洋留學回來的，很優秀，教書認真，老師人數比學生多，所以至今對老師們都還印象深刻，戰後他們返日，受命部長、教授、法官等職，都很有出路。其中矢野學部長最令人感念，在我畢業後幫助很多，民國四十年我去日本接洽業務時，還特地與矢野學部長等三位老師聚餐。

為求生活計，遠赴滿洲國

當時政學科畢業生出路不外是做判官、入株式會社

（當時台灣最大的公司是蔗糖公司），但是畢業後我去了滿洲國（註），時年廿六歲，於二二八事件後才回到台灣，那個恐怖的時代我不在。

我為什麼要去滿洲國呢？原因有兩個，其一是在台灣會被台灣的警察欺負，他們氣勢凌人，其次台灣人與日本人同工不同酬，有差別待遇。日本人做判官（委任官）多六成薪資，比如本俸六十元，日本人加六成，那時夫妻二人租房子，一個月十二元即可生活。適逢畢業那年，第一屆滿洲國文官考試在台灣舉辦，我報名參加，筆試和口試均通過，主考官也是大學時老師，原以為篤定過關，沒想到體檢胸圍不及身高一半不合格，後來才去考銀行，受訓六個月後，到滿洲興業銀行（當時有兩家銀行，一為中央，一為興業）工作，就這樣進入銀行界，從基層做到支店長代理（今襄理）兼事務主任。回台後到華南銀行上班，從試用的業務員做起，半年內即竄升至經理，六十六歲退休。

據我所知，到滿洲的台灣人有廿來個，去的人不外乎官吏、銀行人員和生意人。滿洲建國號大同，我廿六歲去時為康德四年，當時住有三千萬人，我先後在當時新京（長春）、大連和哈爾濱三地住過，共十一年。

大學時認識現在的夫人，她是大溪人，當時在醫院

擔任護理長，我們畢業後結婚，一起去滿洲國，四個子女一在新京、三個在大連出生。現在長子在銀行任職，次子在美國洛杉磯開餐館，三子自營貿易，女兒從事書法、西畫創作，她出生於新京，我們為她取名京子。

在滿洲國非但沒有在台灣差別待遇，反而帝大畢業的比日本一般大學畢業生多五元薪資，長春加四成，哈爾濱加八成，靠近蘇俄邊界更高達十四成。

烽火煙硝逼，歷險始歸來

最後四年定居在哈爾濱。戰爭末期，日本人陸續撤退，我和朋友合夥小攤賣香煙謀生，同時蒐購日本人的藥、酒等物資，然後在位於哈爾濱最熱鬧大街上，一間被棄置的日本西服店開張營業，取名「華南貨店」，1935年開張到1936年年初，生意非常好，滿洲人、八路軍都來買，曾經被留守日人舉發，政府「特產管理處」派了五、六個人來查了兩次，我說我是台灣人都沒事，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大膽。

光復後，發生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李兆麟被暗殺事件，肇事的槍枝為國民黨地下工作站從興業銀行取得的，而當時我留守銀行有保管之職，結果又遭檢舉，先後被國民及共產兩黨抓過，分別關了三天及一個月，第二次花了卅萬元才放人。

俄國眼見日本快戰敗，1935年八月九日向日本宣戰，八月十五日即停戰，哈爾濱光復後，俄國入侵，姦淫擄掠，無惡不作，拿我們當對抗日本的「肉墊」，國民黨抗議，俄國退兵，然後國民黨進來，接著八路軍跟

進，國民黨又撤退；時局混亂得很，遂想回台灣。

逃亡前一個月即從短波收音機收到日本放送台灣發生暴動，三人同行可以無條件打死的信息，有一次還無意收到台灣放送，聽到蔣渭川叫男女學生各別去定點集合云云，當下志忑，心想怎麼辦？

日人撤退時，八路軍說我們是抗戰國的子民，不能與日人同行，並表示會代為安排，到1936年三月份確定要啓程時，美國救急總署（停戰後，美國協助日人返國的臨時組織，救濟難民物資和現金）已經撤消，主要的交通幹線——滿洲鐵道也被炸毀，只好換大板車代步，老弱婦孺約一百人，顛簸了十天，才到長春。到長春後，從營口坐船到上海，再從上海搭中興輪回台灣，三月廿九日出發，返抵國門時已是六月十五日，逃難歷時兩個半月。

返台後先到大學同學楊南洲北投家中住一陣子，楊從台北市工務局長退休，在滿洲國任哈爾濱副市長，也是我們逃難的難民團團長。

從哈爾濱到長春這十天過程最驚險。當時國共大戰，據說團體行動若被發現會遭空炸，路上擔心土匪搶劫、馬車伏藉機揩油、夜裏宿馬寮、吃饅頭裏腹等等辛苦莫名，無時不膽顫心驚，總不免嗟嘆之前生活如在樂土，而今恍如隔世。

註釋：滿洲國為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後製造的傀儡政權（1931～1945），建都長安，國號大同，並挾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元首，1934年改稱滿洲帝國，改元康德，長春更名為「新京」，二次大戰結束時瓦解。